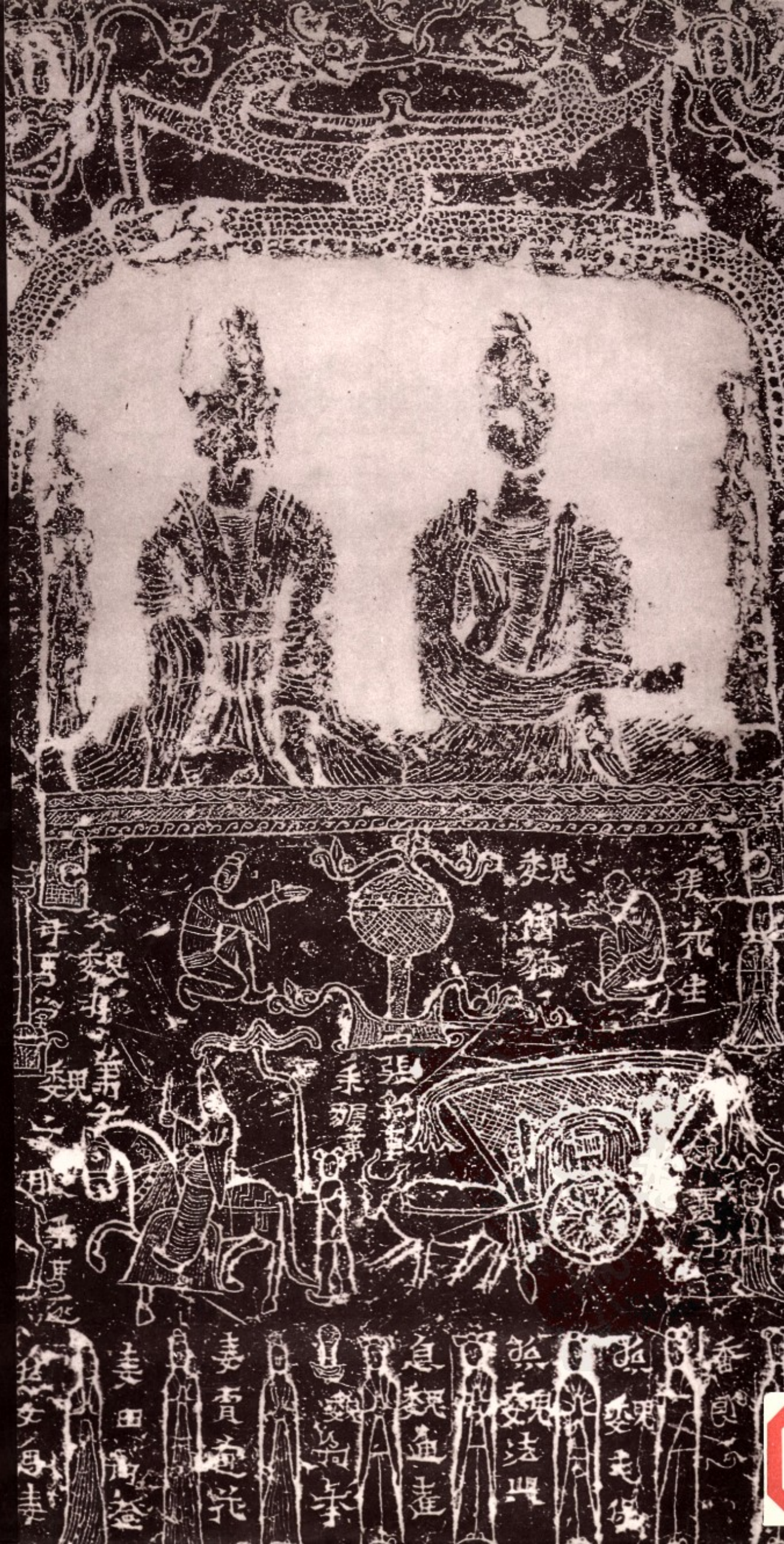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



26.32953 K879.3
31428 S167

陝西省耀縣藥王山博物館
陝西省臨潼市博物館
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

合編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FH 3/4 20

本書編者享有本書版權。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復制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份或全部。否則，必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追究其責任。

「津」新登字〇〇七號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

編者

陝西耀縣藥王山博物館
陝西臨潼市博物館
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

出版發行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和平區張自忠路189號)

印刷 北京印刷二廠

版次 一九九六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二〇〇〇冊

印張 二〇·五

定價 二百二十八元(人民幣)

書號 ISBN 7—80504—469—4/J·70

責任編輯及封面、版式設計：張燕

策劃執筆 張 燕

碑文校定 趙 超

編 委 肖高社

趙康民

王福民

籍和平

拓 工 趙永峰

繪 圖 劉君幸

攝 影 張明惠

序言

張燕

佛教於東漢由印度傳入中國，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已經在民間普及開來。全國各地，尤其是北方一帶，民間雕佛造像蔚然成風。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條件下，人們常以家族或結邑的宗教組織方式集資，採用在中國產生已久的石碑形式，雕造出供奉佛像的一種宗教石刻——造像碑。以後道教信徒也採用了這種形式。這種刻有佛、道像的造像石碑，一般立在村口、路邊及寺廟內，供僧人、信徒設齋供奉，頂禮膜拜。

現存的造像碑大多發現於北方地區，主要集中在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等省。陝西關中渭河兩岸是遺存造像碑最多的地區，約有二百五十至三百餘通。其中耀縣藥王山博物館和臨潼市博物館是國內最為重要的造像碑收藏地。藥王山博物館中現存石刻、石碑及摩崖造像，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計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諸朝佛教、道教、佛道混合造像碑百餘通；佛、道教圓雕石造像及石塔五十餘座；北周、宋、金、元、明、清、民國歷代石碑一百三十餘通；隋、唐、金、明摩崖造像四十三尊；金代古建一座；道教宮觀壁畫兩幅；明、清建築群兩處和大量明、清石碑坊、石雕藝術作品。藥王山是以祠祀唐

代藥王孫思邈爲主，其碑石保存數量在陝西僅次于西安碑林。臨潼市博物館建有碑廊，收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造像石刻二十餘件。這些造像碑對於研究北朝宗教、民俗及文化藝術都具有重要價值。本書從這兩家博物館的藏品中，選出有明確北朝紀年，含有道教造像內容的十八通造像碑，供專家學者研究。

陝西造像碑風格以渭北地區（渭河北岸）造像碑爲代表。筆者在整理這一地區造像碑的過程中，作了一些初步的調查研究，現將有關問題簡述如下。

一、北朝道教造像碑在渭北興起的歷史背景

早期道教造像藝術，發現資料甚少，在這方面的研究與佛教相比幾乎形成空白。由此，渭北地區的有關早期道教資料就顯得尤爲重要。目前，我們在渭北地區發現的北朝至隋代道教、佛道混合造像碑的數量約五十餘通，占目前全國已知同類資料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早期道教造像碑在這里爲什麼會如此盛行，其歷史背景是怎樣的呢？

關中道教的流行初始于東漢末年，建安二十年（二一五年）漢中五斗米道教主張魯降曹，隨之北遷鄴城，由此大批五斗米道信徒也追隨教主北遷，定居中原。《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大道家令戒》記載這次北遷：「至義國殞顛，流移死者以萬爲數，傷人心志。自從流徙以來，分布天下。」^①從此，陝西地區開

始有道教信徒。北魏時期，在關中出現了世奉天師道的豪宗大族，如馮翊萬年縣（臨潼市東北）的寇氏家族，就是三國時期由漢中徙居長安三輔地區五斗米道的后裔^②。天師道大師寇謙之、北魏高僧玄高之母寇氏，均是此族中一員，信奉道教^③。臨潼博物館藏有寇阿智家族造像碑，寇氏在這個地區為豪門顯族。由於長安道士受到北魏皇帝的優寵^④，因而道教在這一地區得到普及發展。

寇謙之在舊五斗米道的基礎上進行宗教改革，依靠崔浩取得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使之「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據《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改革天師道，「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天師道在強調維護封建國家統一的前提下，整頓組織，加強科律，增訂戒律和齋醮儀範，模仿佛教，重視誦經禮拜，道教老君、天尊造像的出現顯然與之有關。北魏都城東南的天師道道場上即置有天尊和神仙諸像^⑤。最初的道教造像的出現，完全模仿佛教造像，是與佛教抗衡的重要手段之一^⑥。

早期的佛教、道教、儒教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寇謙之的天師道，以儒家禮法充實其內容，鑒以佛教戒律為其形式，有意借助佛教，故新道教在理論和形式上都受到佛教的影響。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年）太武帝滅佛

事件雖直接涉及佛道二教相爭，但其根本原因是出于政治鬥爭，宗教鬥爭爲次。所以幾年之後，文成帝即位，廢佛令便全部終止。佛教的恢復，加上道教的流行，使關中地區成了一個佛、道同時廣泛存在的宗教世界。北周武帝時期，佛、道二教矛盾激化，經過反復七次三教大辯論，在建德三年（五七四年）周武帝下詔「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并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⑦在這次滅佛中，道教中的樓觀道派起了積極的作用，實際上，受打擊最大的還是佛教。

樓觀道是與寇謙之天師道同時在北方興起的又一道派，它以陝西盩厔縣樓觀臺爲活動中心，樓觀道派在北魏時期已形成教團，至北周達到鼎盛。樓觀道士多來自關中，著名道人梁謨、馬儉、侯楷、王延、嚴達等均爲京兆、扶風人，他們都是樓觀道的重要宗教領袖。關中道碑的出現，與樓觀道的興盛有密切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個戰亂頻繁、政權屢變的時代，百姓難以謀生，農民便經常利用道教李弘名義號召民衆舉行起義^⑧，直到隋代，扶風人唐弼還打着李弘的旗幟進行反抗^⑨。《道藏》中《洞淵神咒經》曾讖言西晉永嘉之亂后某一個甲午之年：「長安開霸……道法盛矣，木子弓口，當復起馬。」老君當治，李弘

應出」的識語在關中民間影響極大。貧苦百姓把擺脫命運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的降生，而農民領袖則利用道教李弘名義來「蟻聚人衆」，以達到「稱官設號」、「壞亂土地」的政治、經濟目的。

綜上所述，北朝關中地區道教造像流行，與漢中五斗米道北遷、北魏天師道、樓觀道派興盛及農民利用道教李弘號召起義有關，是社會現實的反映。

二、供養人題名反映的當時民族聚居及民族融合

兩晉南北朝時期，關中渭北地區主要居住着氐、羌、匈奴及鮮卑雜胡等族，他們或自成村寨，聚族而居；或與漢族交錯雜居，互通婚姻。十六國時期，氐、羌在關中已形成很大的政治勢力，前漢劉曜都長安時，曾把統治六夷部落的單于臺設在這些少數民族集中的地區咸陽，「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為之。」^⑩這一時期，大批氐、羌陸續徙入長安，最多一次達二十餘萬人^⑪。據《晉書·劉曜載記》記載，巴氏反叛，關中大亂，羌、氐、巴、羯應之者達三十餘萬人。前趙亡，後趙石虎建都于襄國（河北邢臺），遷關中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二州^⑫。至石趙末年，史稱：「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⑬這些由秦、雍二州移到關中的氐、羌，初由苻洪、姚弋仲，後由苻健、姚襄率領，又回到關中，建立了前秦和

後秦。江統《徙戎論》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所謂戎狄之中，是以氐羌徙民爲主。後秦姚氏起兵于渭北，活動在三原、興平、耀縣一帶。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中的姚氏家族，推測可能是後秦西羌姚氏的後裔。

氐族文化先進于羌族文化，《魏略》^⑭云：氐人「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根據文獻可知，氐族因與漢族錯居，受漢文化影響很深，有類似漢族的姓氏，以織布、種田、畜養家畜爲生，穿著類同漢族的服裝，並通曉漢語。氐族在十六國時期曾建立了三個國家，即苻氏前秦、呂氏後涼、楊氏仇池，其中仇池楊氏自漢建安元年（一九六年）據仇池（甘肅成縣）建國至梁承聖元年（五五二年）被西魏所滅，共歷三百五十六年，是十六國中歷史最長的一個政權。楊氏氐族自三國時徙入關中^⑮，三六八年的《廣武將軍□產碑》發現于陝西白水縣，碑銘中有六位氐族楊氏^⑯。在藥王山造像碑中，以楊氏爲主要姓氏的造像碑主要見于道教或佛道混合造像碑，如楊阿紹、楊縵黑、北周楊洪義、隋代楊能、楊瞢先等道碑。北魏景明元年（五〇〇年）的楊阿紹和楊縵黑兩碑，造像風格相同，均有

「北地郡富平縣」（今富平縣南）的題名，兩碑楊氏應為同族。楊阿紹碑中有「楊文要」、「楊文熾」、「楊文安」、「楊文好」題名，均以「文」字排行，在仇池諸王中亦有「楊文度」、「楊文弘」等姓名^⑰，亦以「文」字排行。推測楊阿紹、楊縵黑家族有可能為氏族。氏族流行同族異姓婚制，如苻、楊聯姻，楊縵黑妻、楊小黑妻、楊文要妻、楊文安妻均為王氏，氏族有王氏^⑱；楊阿紹妻姜氏，也可能為氏族^⑲，推測均為同族異姓內婚之例。在藥王山造像碑中，氏、羌、匈奴諸族也有不少互通婚姻的例子，如劉文朗道碑中有劉續妻姚時上，姚氏為西羌姓，而劉氏則不會是西羌姓氏，或為匈奴族，或為漢族，應為匈奴或漢族與西羌通婚一例。

在渭北造像碑中，我們常見的氏姓有楊、呂、王、吳、仇、毛、苻等；西羌姓氏有荔非、鉗耳、似先、雷、夫蒙、彌姐、同瑋、姚等姓氏；匈奴姓氏有張、蓋、劉等。由於少數民族遷居中原之後，迅速分解融合于漢族，到隋代造像碑中少數民族的復姓已不多見，到唐代就很難再從姓氏上區分其民族所屬，這種民族融合的歷史過程經過百餘年的演變已基本完成。

三、供養人的宗教組織形式

陝西造像碑的供養人組織形式有兩種：一種為家族造像碑，這類石碑占總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最早兩例是泰常五年（四二〇年）王同信造像

碑^②和始光元年（四二四年）魏文朗佛道造像碑；另一種則爲宗教結邑造像碑，約六十餘通。陝西最早結邑造像碑，目前發現的是正始二年（五〇五年）馮神育佛道造像碑。北朝時期的民間結邑是在一定的區域之內，某一家族或幾個家族，某一村落或幾個村落的人們以相同的信仰組織起來，這種組織被稱爲「邑」、「合邑」、「邑義」、「邑會」、「法義」等，后來稱爲「邑社」或「社邑」，是屬民間私社的一種。從大量的統計資料來看，民間結邑組織機構松散，邑官設置靈活。邑義一般是由僧人、施主、邑官及邑子組成，在刻有道像的造像碑中出現「三洞法師」、「道士」、「道女」、「仙童」、「侍者」等題名，具有道教組織的特點。藥王山結邑造像碑人數一般在三十至八十人之間，最多爲二百五十人左右。一個邑的規模要看這個村落或家族成員多少而定，通常是以聚族而居的同宗同姓的大族爲主體，如錡雙胡碑中錡氏占百分之八十八，馮神育碑中馮氏占百分之四十九，都是大族。結邑組織中，姓氏種類較多，各種姓氏所占比例較均勻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婦女結邑，異姓婦女是某一同宗大族的婦女或嫁入該族的外族婦女，如絳阿魯碑；另一種爲諸姓合邑造像，在邑義中各種姓氏一般都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這類結邑多爲漢姓居多，或漢與氏、羌混居而成，如辛延智碑。通過這批資料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在渭北地區，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少數

民族往往聚族而居，而漢族諸姓則以混居為主，兩者區別很大。

四、造像碑的時代風格及藝術價值

北朝道教和佛道造像碑在布局 and 題材上與佛教造像碑大同小異，道碑是以龕中雕造老君或天尊像為特點，天尊形象不同于佛像，其特徵為：戴冠、著袍、持塵尾、羽扇，與兩晉南朝時期的上層文人士大夫的時尚裝束相同。但北魏早期的天尊服飾具有明顯的佛教特點，易混于佛像，如楊阿紹碑的天尊造像，身著通肩道袍，類似通肩袈裟，而且作出的手印有同于佛教手印。這種道教手印沒有一定規則，極少重複出現。這是北魏早期道像模仿佛像的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北朝晚期的天尊則一律以手持塵尾或羽扇為特徵。佛道混合造像碑的供養主尊，或佛道并龕；或以佛為主，以道為輔；或以道為主，以佛為輔。如魏文朗碑即是佛道并龕典型之例。

佛道造像碑的碑面布局分上下兩部分，上半為龕楣及龕上裝飾，下半為供養人像。魏文朗佛道碑（四二四年）是太武帝滅佛以前極少數未被毀掉的碑例之一，布局形式成熟，上飾龕楣、瑞禽，下刻供養人出行圖。由于太武滅佛非常徹底，關中造像碑的再次出現，是在七十餘年後，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的四、五年之內（太和十九年至景明年間，四九五年至五〇三年）。這時渭北出現一批布

局簡單、加工粗糙、沒有裝飾，多以發願文爲主的道碑，本書中收錄的姚伯多碑（四九六年）、劉文朗碑（四九九年）、楊縵黑碑（五〇〇年）、楊阿紹碑（五〇〇年）均爲此類風格的道教造像碑。經過這段過渡時期後，碑面布局才又重新出現繁縟的裝飾，如張亂國碑（五一四年），刻出家族出行圖及雜耍場面，雕刻精美細膩。到北魏中晚期，宗教結邑流行，爲適應這種社會情況，碑面布局發展到綫刻供養人畫像分層排列的形式，這種布局形式一直沿續到唐代，是北朝晚期造像碑主要布局形式之一。

造像碑上的發願文多刻在碑陽龕下或碑側龕下，渭北造像碑的書體與龍門石窟題記中典型的北碑書體不同，以拙樸自然爲特點。姚伯多碑即以其書法質樸勁拔名噪書壇，成爲重要的碑刻之一。所謂北碑，是與南帖相對而言，主要是指孝文帝遷洛之后（四九五年）到隋代統一以前的碑刻、摩崖刻石和墓誌書體，遺迹宏富，達數千餘種。北朝書體介乎隸楷之間，處于漢隸向唐楷的轉化過程，雖還有分書韻味，但已不同于漢隸，在書法演變史中是一個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很值得我們重視。自從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爲倡導碑學以來，習仿北魏書體曾風靡一時，蔚爲壯觀的《龍門二十品》得到了舉世公認，就是突出一例。本書中選錄的北朝書碑，出于工匠和民間書手，書體質樸，意味濃

鬱，雖不能與那些名碑巨制相提并論，却也生機勃然，天真可愛。其特點為結體自然、隨意，用筆方中有圓，柔中寓剛，是典型的民間書體風格，與其造像的藝術風格相互輝映。當我們遍游古代碑帖瀚海之後，再細讀這些碑刻，大有返樸歸真的無窮興味。書中公布的資料正是書法家及愛好者多年所尋求的珍品。由于這些碑拓均屬首次問世，無疑將會受到書法愛好者的關注和歡迎。

本書的編集，只是介紹藥王山造像碑的一個開始。我們希望有更多古代造像碑珍品繼續與讀者見面，使有關研究和欣賞向更高層次發展。

注釋：

① 《正統道藏》第三十冊。

②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崔浩與寇謙之》，《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③ 《高僧傳》卷第十一《宋偽魏平城釋玄高傳》曰：「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

④ 《魏書·釋老志》曰：「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徵詣京師。……世祖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溫雅，言對有方，遣與尚書崔頡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者前後數人。」

⑤ 《隋書·經籍志》曰：「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

⑥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釋法琳《辯正論》自注：「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作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

⑦ 《廣弘明集》卷第八《周武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⑧ 唐長孺：《史籍與道經中所見的李弘》，《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⑨ 《隋書·煬帝紀》大業十年（六一四年）：「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為天子，自稱唐主。」

⑩ 《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

⑪ 《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曰：「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候其無備……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

⑫ 《晉書》卷一〇五《石勒載記》曰：「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⑬ 《晉書》卷一〇七《石季龍載記》。

⑭《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引注。

⑮《三國志》卷三十《魏書》引《魏略》云：「建安十六年（二一一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王）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楊）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后兩端者，置扶風、美陽。」

⑯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⑰李祖桓：《仇池國志》，書日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⑱《資治通鑑》卷一〇六《晉紀》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楊）璧妻，（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

同書卷一〇四：「（毛）興、（王）騰并苻氏婚姻，氏之崇望也。」

⑲《周書》卷三三《趙昶傳》卷四九《異域上·氐傳》：「沮水氐酋姜多。」

⑳藏美國芝加哥自然博物館，應出于渭北地區，造像風格同樂王山造像碑的北魏風格一致。